

1996年，第一次有人向我提出這個問題。當時我們在談論香港回歸的話題，香港一直是英國的租借地，與中國政府談判《新界租約》續約問題受阻後，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夫人¹決定把全香港地區歸還中國。²

1983年7月，撒切爾夫人提出“以主權換治權”的要求：香港的主權歸還給中國，但是英國擁有香港的治理權。令英國政府吃驚的是，面對撒切爾夫人的提議，當時由鄧小平³領導的中國政府並沒有給出預期的反應，而是拒絕了。倫敦方面表示很不理解。

在一些英國外交官看來，這是一場信奉共產主義的所有者和資本主義的承租人之間的紛爭，英國這麼做純粹是為了避免和中國產生衝突，畢竟撒切爾夫人一向以冷靜理智著稱，她曾經果斷地表示，殖民地已經不能再給英國本土帶來一分一毫的收益，相反，英國為維持在殖民地的統治耗費巨大。

1 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H. Thatcher，1925—2013），1979—1990年任英國首相。

2 1979年，香港總督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主動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提出關於《新界租約》續約問題，以為香港的經濟發展為名，逼迫中國政府延續租約。對此，中方予以拒絕。1982年9月，撒切爾夫人訪華，主要目的是要解決中英兩國關於香港方面的一些“分歧”。中國時任領導人鄧小平明確向她表示“如果英國執意阻撓中國收回香港的步伐，那我們也不得不重新考慮動用武力收回香港主權的道路”。會談結束後，撒切爾夫人在走出人民大會堂時意外地絆倒在台階上，由此可以看出她當時的震驚情緒。後來，在晚年的回憶錄中，她談到了當年緣何決定歸還香港：“我們是在同一個不肯讓步並且在實力上又遠遠超過我們的大國打交道。”——譯者注

3 鄧小平（1904—1997），四川廣安人，早年赴歐洲勤工儉學，歸國後投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鬥爭，1978年12月成為中國的第二代領導核心，1990年退休。

在葡萄牙方面，當時由馬里奧·蘇亞雷斯（Mário Alberto Nobre Lopes Soares）¹ 領導的進步政府也主動提出提前歸還澳門²，然而中國政府同樣表示拒絕。³

中國的反應讓人費解。這怎麼可能呢？中國政府一直宣稱台灣⁴ 必須回到祖國的懷抱，但在香港和澳門問題上，他們似乎沒有表現出像收復台灣那樣的熱切。鄧小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到底在想什麼呢？

在歐洲，數百年以來，領土紛爭一直是所有戰爭的焦點，皇族之間試圖通過各種聯姻來避免戰爭，最終卻都歸於失敗。再往上追溯歷史，情形更是如此。甚至在文藝復興之後和大革命之後，對領土的癡迷仍舊構成所有紛爭的焦點。在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拿破崙統治期間，甚至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很多城池都是幾易其主。例如，為了同奧地利王位繼承人聯姻，那不勒斯被贈予給了洛林家族。這只是千千萬萬事例中的一個。再說說法國的阿爾薩斯和洛林，這兩個地方的歷史也很好地解釋了歐洲人的主權觀念和金錢紛爭。所以對於一個

1 馬里奧·蘇亞雷斯（Mário Alberto Nobre Lopes Soares，1924—2017），1973 年創建社會黨。1976 年成為葡萄牙總理。1978 年，他所在黨派在選舉中失利。1983 年，他重新掌權，1985 年又被排擠下台。1986 年，他以 2% 的微弱優勢擊敗競爭對手，贏得總統選舉。五年後，他以絕對多數票獲得連任。1996 年，他徹底退出政治舞台。

2 早在 1976 年，葡萄牙代表曾向中方提出可以提前歸還澳門，以此表達善意與中國建交，但附加要求是澳門要以殖民地身份回歸。中國方面予以拒絕。——譯者注

3 《在香港生活》（塞爾日·貝爾蒂著，L'Archipel 出版社，2017 年版）。最新版本將於 2023 年出版，收錄了 2017—2020 年發生的事情。

4 書中原文用“福摩薩”一詞，該詞是葡萄牙語和拉丁語的直譯，意思是美麗的島嶼，是佔領者給予台灣地區有殖民意味的稱呼。——譯者注

有著數百萬人口的城市的主權不感興趣，這怎麼可能呢？中國人到底在想些什麼呢？

通過上述簡單的例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的思維同瑪格麗特·撒切爾和馬里奧·蘇亞雷斯都截然不同。很明顯，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與我們不同。他們從來不像我們這樣看待世界，以後也不會。

這裏我要明確一下本書中出現的“我們”這個概念。如果因為中國社會的文化、語言和思維方式而將“他們”看作一個整體，那麼我也同樣稱整個西方社會為“我們”。這裏的“我們”只是一個粗略的概念，因為西方社會其實是個大雜燴，它包含的兩種文化——歐洲文化和美國文化——其實也在漸行漸遠。對於新加坡人來說，“我們”指的是“高加索人”，20世紀80年代，我經常在他們的地圖上看到這種用法。

在法國，四十多年來，立法導致大家已經不再使用白種人這種稱謂。¹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卻稱中國人為黃種人。此處我指的是歐洲的白種人文化（不包括俄羅斯，同中國有大片領土接壤的俄羅斯，在思維方式上與我們完全不同）和中國的黃種人文化。由此可見，我們的思維方式都是拿自己做參照物的，比如“我們的”戰爭、“我們的”十字軍東征、“我們的”殖民地、“我們的”前任和現任政治領導人，還有“我們的”民主，雖然並沒有人能夠真正說清楚這個

1 法國從憲法中去掉了“種族”一詞，禁止進行族群人口統計。——譯者注

民主到底是什麼。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對提前收回香港和澳門的訴求並不強烈，他們對此沒有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也不打算為了“提前”收回而作出重大讓步。中國覺得保持現狀對他們有好處。當時（20世紀80年代）最重要的是，這兩個地方運轉良好，經濟欣欣向榮。從地理上講，維持現狀對香港和澳門有好處，對中央政府也有好處。改變現狀反而會帶來風險。所以當時中國方面的想法是“有必要提前收回嗎？”而對英國和葡萄牙來說，答案是“有必要”，然而這並不是因為他們關心當地居民的處境，而是跟前面我們講過的一樣，他們習慣於通過聯姻或主權等交易換取利益。他們只關心這個交易對誰有利，對英國的保守黨有利還是對中國的共產黨有利？其餘的事情，比如佔領地人民的命運將會如何，西方並沒有那麼關心。

鄧小平拒絕了撒切爾夫人的提議。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當時香港和澳門兩座城市加起來人口也不過五六百萬，而中國政府更關注的是另外十多億的人民，這其中有八億人是貧困的農民。因此，對中國政府來說，把大量時間和精力投入到解決一個只要租約到期就會迎刃而解的問題，著實沒有那麼必要。這其實很好理解，但是英國人理解不了。

市面上有大量的書籍在剖析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可以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概括：中國人從來不會像歐洲人那般行事。所以我們一直在重複犯下一個錯誤，即將我們的思維方式強加於人，而時間也一再證明我們錯了。

所以英國外交部錯誤預判了鄧小平的反應，當然他們不是唯一犯下這種錯誤的。專家們寫下成千上萬的著作來告訴我們：1991 年末蘇聯解體之後，中國的政治體制也已經行不通了，以後必將傾塌。

三十年後，事實證明，多米諾骨牌理論在這裏失靈了，這是因為中國和蘇聯本來就不一樣。

在所有攻擊中國的視角中，有一些報告預見中國的銀行系統或將很快破產，然而這一天並沒有到來。要知道撰寫這些報告的專家們最擅長的是在已經發生過的股災和金融危機面前放馬後炮。其中沒有任何一個專家能夠預見到這個事實：在他們眼皮子底下，一家中國銀行已經不聲不響地佔據了世界銀行排行榜首位。¹

我們還在繼續犯錯。在某種程度上，西方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同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隔絕開來。在這一點上，西方可從不願屈居第二。

我們的政治學家、記者和學者們每天都在電視和報紙中滔滔不絕，稱中國的政治體制如何有害，政府如何虐待人民，甚至將其監禁。

1 英國品牌評估機構品牌金融（Brand Finance）發佈的“2021 全球銀行品牌價值 500 強排行榜”，中國工商銀行排名第一，2022 年中國工商銀行以 751.19 億美元的品牌價值蟬聯榜單第一名，參見：<https://brandfinance.com/press-releases/brand-finance-banking-500-2021-sber-named-worlds-strongest-banking-brand>, <https://www.scribd.com/document/556202283/Brand-Finance-Banking-500-2022-Preview>。——譯者注

《世界報》記者讓·米歇爾·貝扎特（Jean-Michel Bezat）¹ 在 2020 年 8 月 31 日的專欄中寫了一段話，可以用來總結許多人的觀點：

“幾個月以來，在中國的法國企業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整體形勢令人擔憂。2019 年 11 月到次年 1 月之間，中國一直在掩蓋新冠疫情，這造成了越來越多的不信任；同期，香港受到了教訓，台灣也面臨著威脅，中國在南海不斷地發出領土訴求，在新疆對維吾爾族少數民族進行了種族清洗。”

然而，這些其實都是我們西方人的臆想。

我們可以看到，香港近年的騷亂事件同中央政府毫不相干，所謂台灣面臨著威脅也是二十年來的老生常談，中國在南海的領土訴求，也並不比美國不請自來、想要介入中國海的願望更為強烈，而所謂的“種族清洗”，是歐洲歷史上曾發生過的事件，在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的語境裏，甚至都沒有這個詞彙。

對於前述“中國罪狀”，這名記者沒有提供任何證據，因為根本不存在。即使在經濟領域，這名記者也沒有找到什麼真實證據。從 2020 年 3 月開始，中國的經濟就重新實現了正增長。截至我寫作本章節的今天，中國的外貿也處於正增長，世界第一大港口上海的吞吐量更是剛剛打破了其 2020 年 7 月以來的最高紀錄。

很明顯的，歐洲和美國都避免談到的是：從 1980 年到 2022 年，

1 讓·米歇爾·貝扎特（Jean-Michel Bezat）於 1984 年開始其職業生涯，當時他是《醫生日報》的記者。1989 年他加入《回聲報》，1995 年成為《世界報》的記者，到 2020 年他仍舊在《世界報》工作。

不管中國走的是一條什麼道路，中國確實使一部分人富起來了，而這些富起來的人口數量超過了所有西方所謂民主國家的總人口數。

而這些所謂民主國家這些年來只幹了一件事：創造了分發俸祿的選舉機器。¹

如今，用於反華的成套手段中又多了一個新工具：新冠疫情。中國每天都在遭受無端的抨擊。這成了特朗普總統最常談論的話題。而新總統拜登，這位政治上的老人（1973 年他就被選為議員了），2021 年上台之後對中國的論調與特朗普的並沒有根本區別。

“美國說，中國人在撒謊。我們國家死了這麼多人，他們怎麼可能才死那麼少的人？我們才是最好的國家。我們的醫療系統全球第一。所以他們肯定撒謊了！”經過西方媒體兩年來不遺餘力地狂轟濫炸，大多數西方人最後都相信了是中國在撒謊，雖然他們並沒有看到證據。

事實上，說到“中國人在想什麼？”這個問題，“他們撒謊”幾乎成了標準答案。總是會有一個“專家”站出來告訴大家，中國在很多問題上一直在撒謊，比如，脫貧、新疆、華為，還有這個國家的穆

1 法國在 15 年裏選舉了 150 個部長。

斯林群體的問題。當中國人解釋說這些針對他們的指控都是謊言¹的時候，大家都開始冷笑。誰會去相信一個撒謊的人呢？日後，雖然有人揭露這些假消息都是被操控而產生的，但是西方的民眾對此知之甚少。

再說說所謂的“種族清洗”，《世界報》的記者讓·米歇爾·貝扎特在報道中所說的種族清洗，其實是西方人自己的臆想，記者在濫用這個詞語。要知道，維吾爾族人口增長速度其實比漢族還要快，至少肯定比法國人口增速快得多。然而，卻沒有一個西方記者對此感到不合邏輯。

總之，我們的媒體報道一直與伯納德·亨利·萊維（Bernard-Henri Lévy）² 和一些政治小團體沆瀣一氣，而這些政治小團體向來喜歡拿謊言當戰術，他們從不關心真相到底如何。

像伯納德·亨利·萊維這樣謊話連篇的詐騙分子，在法國都有不少擁躉，他一直在法國各大媒體³ 高頻率地出現，擔任新聞評論嘉賓。法國媒體從來沒有提出過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像法國這樣的謊

1 塞拉芬·博諾（Séraphin Bonnot，應該是化名），是漫畫雜誌《草原的回聲》（*Echo des Savanes*）的社論撰稿人，提出了下面的問題：“為什麼人們總是要妖魔化對手？”“妖魔化對手，”他寫道，“其實是一種對自我的譴責。所謂思想正統的人（我希望你們都不是）都自我感覺良好，以為自己認為的都是對的，其他任何同自己想法不一致的人都是可怕的傻瓜。這不是強者思維，正相反，這其實是一種弱者思維，這種思維狹隘、獨裁、排外又單一。不承認別人可以有另外的想法，又無力跟別人抗爭。”詳見《草原的回聲》第342期。

2 伯納德·亨利·萊維（Bernard-Henri Lévy），生於1948年，法國媒體人。

3 可以讀一讀調查記者傑德·林德加德（Jade Lindgaard）在2012年發表的文章《伯納德·亨利·萊維體系，毫無思想的哲學將給世界帶來戰爭》。

言政治在中國行得通嗎？

現在讓我們誠實地來回答這個問題，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理由很簡單——大數定律¹，在涉及任何有關中國的課題時，我們都不要忘記得從這個角度出發去考慮問題。

我們拿疫情對法國的影響來舉例，並把這個例子套用在中國身上試試看。在法國，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²、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çois Gérard Georges Nicolas Hollande）³和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⁴三任總統相繼削減預算，一味追求經濟利益，嚴重破壞和削弱了法國的醫療體系，全國的病患數量只要增加2%，醫療系統就會不堪重負。這種完全缺乏彈性的體系引發了巨大的經濟災難，國內生產總值陡降20%。

更令人吃驚的是，個人自由也消失了，而我們一直相信我們的自由是最有保障的、是不可侵犯的，法國也一直標榜本國在保護個人自由方面做得最好，甚至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可以與之媲美。而我們遭遇的慘敗使得我們對中國政治體制的所有批評都顯得蒼白無力，我們一直批評中國政府剝奪人民言論自由的做法也令人反感。

1 數學好的人可以讀一讀丹尼爾·杜格（Daniel Dugué）的《基礎數學、概率數學和應用數學詞典》，阿爾賓米歇爾出版社（Albin Michel），巴黎，1998年中的“概率計算”部分。

2 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生於1955年，2007—2012年任法國總統。

3 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çois Gérard Georges Nicolas Hollande），生於1954年，2012—2017年任法國總統。

4 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生於1977年，2017年5月14日當選法國總統，2022年4月24日成功連任法國總統。

所以，一個撒謊的政府，一個掩耳盜鈴的政府（法國一直拒絕進行族群人口統計），一個在公共衛生服務方面做到如此糟糕程度的政府，放在中國是完全不適合的，因為中國的體量擺在那裏。稍加思索就會知道，法國只有七千萬人口，可這麼一個錯誤就讓我們陷入了不可收拾的境地，中國的人口數量可是我們的二十倍之多，那麼造成的損失也要乘以二十倍。因此這是絕對不合適的，也犯不起這個錯誤，否則可能引發全球經濟的癱瘓。

中國領導人的頭頂上一直懸掛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這使得他們一直覺得自己身負重任，而西方領導人已經很久沒有這種責任心了。

中國歷史上並沒有出現過因為瘟疫導致其 30% 的人口死亡的情況，而歐洲有過兩次這種慘痛經歷，第一次是查士丁尼大瘟疫（541—767 年），隨後是 1347 年源於克里米亞地區的黑死病，造成了 7500 萬歐洲人口死亡。這值得我們深思和保持謙卑。

1850 年之前，中華帝國從來沒有遭遇過類似歐洲黑死病那般的特大瘟疫，一般都是一些散發性和區域性的疫情，多發生在邊境附近（比如雲南、湄公河盆地，或者南方的廣東省）。1840 年以前，這個國家從來沒有因為瘟疫而導致全國範圍內的餓殍遍野。（需要指出的是，導致中國出現饑荒的主要原因向來都是戰爭，1840 年之後，中國遭受了漫長的外敵入侵和戰爭歲月）。

1840 年的鴉片戰爭¹ 是中國經歷的第一次商業貿易引發的戰

1 想了解更多內容，請閱讀作者的另一本著作：《衝擊：中國前行（16—19 世紀）》（Métis 出版社，2014 年）。

爭，它摧毀了四億人構成的社會的平衡，隨後中國人用了一個世紀才緩過來。這是一段印刻在中國人內心深處的經歷。

治理中國人同治理法國人是不同的。在體量上這相當於治理一個 XXXL 號的國家。歐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中國這麼悠久的歷史。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這種治理經驗，我們只需要看看美國現在治理的混亂程度，就會明白治理一個人口眾多、民族多樣的國家有多麼困難了。

要知道 1949 年毛澤東¹ 帶領中國人民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這個國家的人口依然是四億，與 1840 年的持平。如果我們僅僅按照最低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來計算，那麼 1840 年至 1940 年間，針對這個主權國家的侵略戰爭至少令一億中國人失去了生命。

理解這些能夠讓我們正確看待對中國“1958—1962 年大饑荒”的批評，當然，發出這些批評聲音的還是同一群人。一個美國作者馮客（Frank Dikotter）²，2011 年因為寫了一本相關的著作而獲得

1 毛澤東（1893—1976），湖南湘潭人，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1949—1976 年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

2 馮客（Frank Dikotter），荷蘭人，種族主義作家。1992 年發表成名作《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隨後發表了其他富有爭議的作品，如《性、文化與現代化：民國時期的醫學與性控制》（1995 年）、《中國的優生學》（1998 年）、《近代中國的犯罪、懲罰與監獄》（2002 年）、《毒品文化——中國的毒品史》（2004 年）、《中國的現代目標和日常生活》（2007 年）、《開放的時代：毛澤東之前的中國》（2008 年），以及 1958—1962 中國饑荒方面的作品。但其作品隻字未提在大饑荒時代，中國正遭受著美國的經濟制裁。中國政府預料到了未來幾年可能有糧食歉收的情況，因此跟國外訂購了大批稻米和麵粉，但由於美國的禁運，所有物資都進入不了中國，這加劇了中國的饑荒狀況。卡斯特羅時期，美國對古巴使用了同樣的手段，距離我們時間最近的是委內瑞拉和阿富汗的例子，兩國的財政均被美國非法凍結。

了“塞繆爾·約翰遜”非虛構類文學獎。這個獎項由英國廣播公司頒發——鑒於英美兩國的親密關係，這個獎項的客觀性值得商榷。要知道，英國廣播公司管治機構 BBC 信託的主席可是彭定康，這位英屬香港最後一任總督是反華急先鋒，卸任後還被冊封為英國終身貴族。

馮客原本是荷蘭人，生於 1961 年，1992—2013 年間，他因為不斷撰文抨擊中國而聲名鵲起。中國這場不可避免的大饑荒造成了數百萬人死亡，而饑荒發生的三年前，中國軍隊剛剛在朝鮮戰場戰勝了美國，粉碎了後者試圖分裂朝鮮半島的企圖。我們可以說，大饑荒是失敗後侵略者再次發動的第二場戰爭，這就跟越南的情況一樣，美國在越南輸掉戰爭後，越南遭受了長期的禁運和饑荒。

從個人角度來說，很難定義什麼是全球性的重大事件。但是中國的內戰確實是致命的，大部分的革命家庭在戰爭中失去了親人，他們或是丈夫，或是妻子，有時候甚至是雙方都犧牲掉（中國前總理李鵬就是個孤兒，他的雙親是革命英雄，雙雙在戰爭中犧牲），數不清的孩子也提早離開了人世。¹

最終，儘管由於各種原因，造成了這些難以計數的人類損失，到

1 更不用說被日本人殺害的數不清的中國平民了，日本人從 1937 年開始轟炸中國各大城市，美國緊隨其後，一直到 1945 年戰爭結束。南京大屠殺都記錄在案。六個星期內，有 20 萬到 30 萬平民被日本人殺害。中國內戰從 1927 年持續到 1949 年，持續時間長達 22 年，而僅在 1945—1949 年的五年間，就有超過 700 萬人因戰亂死亡，這都是有據可查的。